



每年4月23日是“世界读书日”。设立“世界读书日”的目的,无外乎倡导阅读风气,弘扬精神文明。

我们一直在努力,不仅因为手中可留书香,更缘于读和享的过程中,自有欢悦喜乐。

两年前的2月14日,我在中国著名的知识付费平台“得到”开了一门课程,题目叫做“安神晚课”,我在“发刊词”里说,这一年至少会为听者“安利”三百本以上的书。

我在课程中曾聊到这样一个话题,很多的爱书人、读书人都是在纷繁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,抽出零零碎碎的时间来读书。事实上,古往今来的读书人都差不多,都没有多少整块的时间。借此“世界读书日”到来之际,我总结一下古人抽空读书的法门,结合着自己的实践,算一笔“读书账”。

“三余”和“三上”

我们身边常常会有这样一些人,说自己不是不爱读书,他们会祭出两个借口来搪塞:一是因为书价太贵,二是苦于没有时间读书。

先说第一个,如今的书价,的确不算便宜。讲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,二十年前,有个朋友开了家书店,周末无事,我时不时会帮忙卖一两天书。当时就碰到不少抱怨书价高的顾客,我的回答是,“不过一包烟钱,少抽一包不可以吗?”

这当然不是个做生意的态度,但我是真的认为,读书是最便宜的文化消费,一本五六十元、三五百页的书,足够消磨至少一周时间,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事情吗?

比起古人,我们算是很幸运了,要知道,传统社会,得到一本书并非易事。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年代,大约在盛唐至中唐之间,但图书的大规模盛行和出版,要到北宋时期了,即使这样,书对于普通人来说,仍然非常稀少而珍贵。

苏东坡有篇文章叫做《李氏山房藏书记》,他在文章里有过一段感慨,“余犹及见老儒先生,自言其少时,欲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而不可得。幸而得之,皆手自书,日夜诵读,惟恐不及。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,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,多且易致”。

如今有了余钱,书籍唾手可得的结果,也带来一些苦恼。美国作家汤姆·拉伯在《嗜书瘾君子》一书中说:“嗜书瘾君子的存在由两部分组成:买书、看书。此乃生命之所以值得延续下去的重要理由。”

这段话我读来非常有共鸣,对于爱书者来说,买书的速度总是远超过读书的速度。更何况,现在社会里,要读的东西甚至还不不仅仅是书而已。杂志报纸,再加上不断从网络上下载并郑重其事保存甚至打印成册的文字,这些林林总总的玩艺,构成了未能完成的阅读生活。读不完没有关系,关键在于总有储备且后援不绝,所谓“家中有粮,心中不慌”。就是这样,头一年还没有来得及阅读的东西,经过整理归类,散落在书架或是别的一些什么地方,混了眼熟后,自以为也已经有知所而不一定非得去正襟危坐地阅读了。

我自己的辩解词是,购买和阅读一定不能简单地划等号。

大学者王国维先生也写诗承认说:“但解购书那计读。”意思是说,只知道买书,但没有余闲和余力去读书。

其实,古人也有类似的难处。三国时代的董遇,就曾哀叹没时间读书,只能利用“三余”。也就是所谓的“冬者岁之余,夜者日之余,阴雨者晴之余”。

翻译成大白话就是,冬天是一年里的空闲时间,这当然是针对农业社会而言的,天寒地冻,只能在屋里“猫冬”窝起来。晚上是白天的空闲时间,而下雨天则是晴天之外的空闲时间。利用好这些“三个余”的时间,就能够好好地读上不少书。

利用“三余”读书,不只是董遇一个人的经验,陶渊明在《读山海经》诗里,有这样两句,“既耕亦已种,时还读我书”。到了孟夏时节,忙碌的耕种已经结束,离秋收也还早,正值农闲,他可以有充足的时间读书。

宋代的大文人欧阳修,在《归田录》里写到:

钱思公虽生长富贵,而少所嗜好。在西洛时,尝语僚属言:“平生惟好读书,坐则读经史,卧则读小说,上则阅小辞,盖未尝顷刻释卷也。”谢希深亦言:“宋公垂同在史院,每走厕必挟书以往,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,其笃学如此。”余因谓希深曰:“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,乃马上、枕上、厕上也。”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。

这是一段很有名的关于读书的记载,台湾出版人傅月庵先生,写过一本《天上大风》就引用并引申出新的意思来。他说,所谓“三上”,指的是骑马赶路的时间,睡觉前的时间,以及上厕所的时间。不妨大致计算一下,这样读书,到底能读多少书。

傅月庵说,时代在进步,马上换成车上,改成公交车、地铁好了,“假设一个人一天搭车15分钟,上厕所也15分钟,睡前到入眠还是15分钟,总共45分钟。一分钟读400字,一天就读1万8千字,一星期七天是12万6千字,每页假设500字,则是252页,大约就是一本书的份量了”。

实话说,真能像傅月庵所说,利用好“三上”的时间,一周读一本书,不算是很难做到的事情。不坐车,自己开车的话,还可以改成听书,一天开一个小时的车,一到两周,也能听完一本书。

当然,“三上”也只是个建议,说到底还是主张利用好各种零碎的空白时间。宋代诗人陆游有两句诗,我特别喜欢:“呼童不应自升火,待饭未来还读书。”说是到了吃饭时间,喊家童煮饭却找不到人,于是自己生起火,架起锅,一边等饭熟,一边就拿本书来读,是不是很有画面感?

大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在日记里也写到过,说是在南昌读书的时候,总是在午饭后到上课前的一个小时,或是在熄灯前的半个钟头,躺在床上读若干页的书,然后迷迷糊糊地睡去,觉得分外有味。

我觉得,这些都是典型的能有效并充分利用零碎时间读书的例子。梁实秋先生写过一篇《利用零碎时间》,他引用英国政治家威廉·科贝特的文章,说是自己学习英语的文法,是在当兵的时候。尽管条件极其艰苦,但床的边沿或者岗哨铺位的边沿,就是座位,背包就是书架,一小块木板放在腿上就是写字台。

因为当兵的收入有限,威廉·科贝特为了买一支笔或一张纸,只能被迫放弃一部分粮食,不仅处在半饥饿的状态中,还必须在十来个战友的高谈阔论、歌唱嬉笑、吹哨吵闹中阅读写作。

威廉·科贝特质问道:“如果我能在此种情形下完成这项工作,世界上可能有一个青年能找到借口说办不到吗?”

读书如“串门”

事实上,恰好就是在各种混乱之中,抽出时间来读书,才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宁静。我最近读到一本清代文人管庭芬的日记,非常打动人。管庭芬是个没有一官半职的普通读书人,在他晚年正逢太平天国起事,浙江海宁老家陷入一片兵荒马乱,不得已只好躲到偏僻的乡下居住。

就是在这样的乱离颠沛之中,管庭芬不断遇到亲友离散乃至暴毙的惨事,加上自己年老多病,内心难免极其痛苦。即使如此,在乱世偷生之余,他还是读书不辍,伤时忧世,感喟良多,并将这些都如实地写到日记里面。

管庭芬在朋友那借来一套书,逐字逐句抄录了一遍后,在前面写下一段文字说,自己为当下的时局感到忧虑愤懑,以至于连着十来天都在呕血。等到病稍微痊愈一点,每天待在老房子里,无法排遣愁绪,只能靠着抄书聊以打发时间。

接下来的这段话,特别让我感动。管庭芬说,自己抄录《待清书屋杂钞补编》四册完毕,自题卷端曰,“忧愤时事,呕血兼旬。病稍愈,日坐卧老屋中,无可散愁,徒手一编,聊以自遣……夫吾人身无拨乱之才及治

读书日

算笔『读书账』

特约撰稿人 周之江



本文作者在书博会上选购书籍。

认,管庭芬的确是个真正的读书人。

杨绛女士在《干校六记》也有类似的回忆,我觉得,也是非真读书人写不出来的文章。书里写到,夫妻俩经过一处菜园,杨绛指着窝棚问钱锺书:“给咱们这样一个棚,咱们就住下,行吗?”

钱锺书认真想了一下说:“没有书。”

杨绛感慨道:“真的,什么物质享受,全都罢了;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。他箱子里只有字典、笔记本、碑帖等等。”

钱、杨二位老人也是借助书的力量,艰难熬过了那段岁月。《干校六记》写到,箱子里带的工具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,女儿钱瑗在北京,源源不断地邮寄来食物和各种外文报刊,再加上干校的“校友”们暗中流通的书,都值得再读。夫妻俩彼此扶持,苦中作乐,并不寂寞。

讲到这里,想起了杨绛女士的一段文字,她写到,“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——‘隐身’串门。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,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,也不怕搅扰主人。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,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;而且可以经常去,时刻去,如果不得要领,还可以不辞而别,或者另找高明,和他对质”。

这绝对是真正的读书人才写得出来的文字,在那些零零碎碎的时间里,不妨抱着“串门”的心态去读书,能够随时有所收获,也可以随时不辞而别。

读闲书不如“闲”读书

我这代人小时候,多半有过看闲书被爸爸妈妈或者老师逮住的经历,挨一顿批评甚至挨一顿揍,大概率免不了。

所谓“闲书”,大多数时候是各种小说,也可能是散文、诗歌、漫画、连环画,总之只要跟学习无关的书,一概都被归入闲书的范畴。转眼几十年过去,家长们求着孩子读点闲书,反倒成了个奢望。

鲁迅先生在《且介亭杂文》里有篇文章,叫做《随便翻翻》,这个题目本身,就表明了读闲书的一种态度。

自打上私塾识字之后,鲁迅先生说,对书就发生了兴趣,家里的几箱子破烂书,拿来翻来翻去,先是找图画看,后来也看看文字。这样就成了

习惯,书在手头,不管它是什么内容,总要拿来翻一下,或者看一遍序目,或者读几页内容,直到现在,还是如此,不用心,不费力,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,觉得疲劳的时候,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,而且它也能够缓解疲劳。

这就算是读闲书的第一个好处了,即在繁忙疲惫之余,借此转换脑筋。好在本来就是闲书,不用刻意地费力用心去读,目的既然在于放松身心,不妨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翻翻,似乎看进去了,又似乎没有看进去,都不要紧,享受这一刻的自得其乐,我觉得就足够了。

当代作家阿城有个说法,简直妙极了。他说自己有个毛病,是爱将有所为有用的书当做闲书读,却不料总是读得很累,因为,读这一类的书,总是先做计划,但又很容易找到理由读得半途而废。反倒是武侠侦探一类的闲书,怎么可能有计划或者找个理由不读了?只有读闲书和闲读书,才会“不忍释卷”,与初衷相反。

鲁迅先生接着说,读闲书的第二个好处,是东翻西翻,翻得多了,很可以冒充博学风雅。他写到,有时碰到一些老实人,和自己闲谈之后,常常佩服他书读得多。殊不知,其实很多都只是随手翻翻,却并没有本本细看。

至于第三个好处,姑且叫做学会鉴别好坏的能力吧。鲁迅说,自己消闲地看书,虽然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,认为这么一来,就“杂”了。但在他看来,也有好处。比如某一家的陈年账簿,每天写着“豆腐三文,青菜十文,鱼五十文,酱油一文”,就知道过去去买一天的小菜要花多少钱;看一本旧历书,写着“不宜出行,不宜沐浴,不宜上梁”,就知道过去有些什么样的禁忌。

甚至,在古人的书里读到一些荒诞不经、乱七八糟的东西,也不要轻易皱起眉头,显示出厌恶的样子,还是可以翻一翻。不要怕被这些东西诱惑,对付的办法是多翻,翻来翻去,就有比较了,比较,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。

很有意思的是,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,也有非常接近的观点,他写过一首打油诗,题目就叫做《读书》,里面这么几句说,“读书五十年,如饮掺水酒。偶得陶然醉,水味还在口。终年不快意,长令舌腹负。久久亦有得,一呷识好丑。”

周作人还有个我特别赞成的态度,“写文章本无一定的规律,无所为固然最好,却亦可以有例外,大抵作者的趣味与见识乃是必要的两重基本,即态度之所以出。古人云,士先器识而后文章,语虽陈旧,实颇有理,盖文章与器识本来是一物之表里耳”。

我平生读书,受此老影响最深,盖无逾常识与趣味两端,缺一不可。而强调有趣也好,趣味也罢,这的确是读闲书的必选项之一。读有趣的书,并且成为一个有趣的人,不论是人于己,我觉得都很重要。古人有句话,说“不为无益之事,何以遣有涯之生”,营养均衡,吃饱肚子,就能活下去,甚至还很健康,为什么我们还

得追求美食,说白了还是得提高人生的质量。读有趣的闲书,也是一样的道理。

忙中“偷来”空隙

当代学者金克木先生写过一篇文章,叫做《“闲”、“书”二话》,第一部分讲关于“闲”的话题。他说,中国人好像对“闲”这件事,多少有些怀有贬义,比如,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。“忙里偷闲”。“闲”是偷来的,见不得人。“闲来无事,不免……”这话在从前的戏曲、小说中常有。接下去多半是要惹祸。

这话说得真假,以至于谈闲话、管闲事、读闲书,乃至于游手好闲,都被统统视为不那么光彩的事情了。金克木说,凡此种种,从来都是遭受忙人和正人所鄙薄的。这就导致,真有一点空闲时间,反倒不知如何打发。这个时候,拿读书来消闲当然很好,可是,什么书才适合闲中读呢?

在金克木看来,对不同的人来说,什么是闲书,很难说得清楚。不过各有所好,各有读法,也许没有哪本书是闲书,也许本本都可以是闲书,但看你怎么读。大概是心闲书也闲,心忙书也闲不了吧?

我觉得,这是个更深刻的看法。说到底,还是心境问题。现代人在上班、求学、创业、带娃之外,还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,生怕自己被时代落下,在社会上缺乏足够的竞争力。

但一旦读书成为负担,也就没有了读闲书的心境。世界上的知识太多,书本也太多,任谁也读不过来,更读不过不知疲惫而且容量接近于无限的AI,于是不免会有焦虑袭来,越发的没有了读闲书的兴致。

汪曾祺先生说“闲书”,有个好玩的角度。我们都知道,在他那一代人的观念里,小说是最主要的闲书,但他却调侃说,短,是现代小说的特征之一。短,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。现代小说是忙书,不是闲书。现代小说不是在花园里读的,不是在书斋里读的。现代小说的读者不是有钱的老妇人,躺在樱桃花的阴影里,由陪伴女郎读给她听。不是文人雅士,明窗净几,竹韵茶烟。现代小说的读者是工人、学生、干部。他们读小说都是抓空儿。他们在码头上、候车室里,集体宿舍、小饭馆里读小说,一面读小说,一面抓起一个芝麻烧饼或者汉堡包(看也不看)送进嘴里,同时思索着生活。

什么叫“抓空儿”,不就是前面说的“偷闲”吗?“闲”这个字很有意思,它也可以写成是门字底下一个月亮的“月”,除了“闲暇”这个意思,也有空隙、缝隙的意思。你看,所谓的闲,不就是繁忙之中的一点空隙吗?

火车铁轨得每隔一段距离,就留出一条缝隙来,以防止铁轨热胀冷缩变形,相互挤压而产生危险。铁轨犹如此,人何以堪?所谓读闲书,闲读书的意义,大概也就在这里。

所谓,读闲书,不如“闲”读书。

■人物名片

周之江,1974年生,1996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,在媒体工作十余年,历任记者、编辑、副总编辑、总编辑,现任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党委委员、副主任。曾与人合著出版《贵州古村寨》,个人著有《小吃纪事》《大时代的小注脚》《食遇:贵阳小吃竹枝词杂咏纪事》《逛吃贵州》,整理并出版了民国时期曾任贵州省主席的吴鼎昌所著《花溪闲笔》及其续编,参与完成国家课题《百苗图现代图谱》等,主编《在孔学堂听讲座》《读到贵州》等,“得到”“安神晚课”主理人。

